



“软联通”视角下福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殷琦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在互联网成为“一带一路”建设重点的背景下,福建要积极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不仅需要积极推动基础设施与经贸合作等方面的“硬联通”,更要重视文化信息传播为主要内容的“软联通”。福建悠久的对外交往历史、数量庞大的海外华人华侨、深厚的人文认同基础等优势都有助于“软联通”的达成与实现,而秉持“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构建分层推进的区域传播格局以及将官方引导与民间参与相结合应成为推进软联通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 福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核心区 软联通

DOI:10.13556/j.cnki.dncb.cn35-1274/j.2017.11.010

作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核心区,福建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入推进的过程中迎来重大发展机遇。为配合“一带一路”这一宏伟的战略构想,福建省于 2015 年 11 月 17 日发布《福建省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方案》,对福建省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的总体思路以及设施、产业、经贸、人文、合作机制、政策措施等方面都进行了规划。但从福建的现实发展情况来看,相较于基础设施建设与经贸合作等“硬联通”工作正按部就班地顺利推进,以文化和信息传播为主要内容的“软联通”发展较慢且所受重视不足,迄今仍停留在教育文化界的交流互访层面,并未形成明确发展路径与系统规划。

事实上,“软联通”的建设议题在国家层面也受到普遍重视,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政策沟通”与“民心相通”与“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被并论为“五通”,政策、文化和信息的传播交流同样得到强调,这其实就是“软联通”的重要思想体现。由此,“软联通”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思想、感情和社会基础,对互联互通其它方面具有极强溢出效应,它与“硬联通”同等重要,两者相得益彰,互相促进。对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而言,“软联通”也迫切需要进一步规划与落实。

因此,本文以福建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为背景,在切实把握福建实际情况与地方资源优势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福建提升“软联通”的具体实施策略,以推动福建“海丝”核心区建设与互联互通的实现。

一、福建省推进“软联通”的地理优势与战略资源

对于福建而言,“软联通”有着天然有利的地理位置与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推动“软联通”的发展。

首先,福建的地理位置极为特殊,“滨海”、“多山”是对其形象且贴切的描述。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的福建有着我国最长的海岸线,其中大陆海岸线总长 3752 千米、海岛海岸线

总长 807 千米,它既倚临台湾海峡与台湾岛隔海相望,也地处太平洋西岸航线的要道;另一方面,福建境内的主要山脉有武夷山脉、杉岭山脉、鹫峰山脉、太姥山脉等,全省 80% 以上的土地面积为山地、丘陵地形,其比例在我国沿海省份与东南部省区中都位居前列^[1]。基于这样的一种地理面貌,福建虽因大部分地区为山地、丘陵而土地贫瘠,但它却有着天然的海域优势,生活于此的福建人民形成了面向海洋,依海而生的传统,也造就了福建对外经贸与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

从历史上来看,早在先秦时期,闽越族“处溪谷之间”或“滨于东海之陂”^[2],他们“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3],成为当时著名的海洋民族。唐宋之后,福建一直是中国海洋贸易与文化交流最为频繁与发达的地区之一,如泉州早在唐代就是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宋元时期更是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港”。到了明清时期,海上活动发展成为福建的经济支柱和发展主导,由于“福建僻在海隅,人满财乏,维持贩洋”,因而其时“出洋贸易者,惟闽、广、江、浙、山东等五省之人,而其中闽省最多”,以海为生的思想深深地渗入了广大民众的观念当中,甚至出现了漳、泉“两府人民原有三等,上等等者以贩洋为事业,下等等者以出海采捕、驾船挑脚为生计,惟中等者力农度日”的说法^[4]。

在海上活动不断拓展的过程中,福建陆续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朝鲜、日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印度、阿拉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东亚、东南亚、中东以及欧美国家形成了悠久且稳固的经贸关系与民间情谊,并一直持续到现在。近年来,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主要国家、地区经贸往来发展更为迅速,如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东盟地区,与福建有着悠久的贸易交往历史。随着福建省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步伐的加快,福建与东盟国家的贸易规模也持续扩大,根据福建省商务厅的数据,在 2013 年东盟便超越美国与欧盟成为福建最大贸易伙伴。而经贸合作的不断扩大也有利于文化和信息传播交流的展开。

其次,伴随着福建海上交通和海洋贸易的展开,福建移民不断涌入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并逐渐成为这些国家社会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建也由此成为著名侨乡。

福建人移民海外兴起于宋元时期,其时福建移民不仅到达印尼等东南亚地区,还东至日本,北达朝鲜,但东南亚地区一直是福建华人华侨移居海外的主要聚居地。直至改革开放后,福建人移民海外的目的国家日趋多样化,范围也不断扩大,20 世纪 70、80 年代福建移民目的地主要为日本与美国,而在 90 年代后又逐渐转向欧洲。在移民数量方面,相关数据资料显示,19 世纪下半叶时,大概有 25 万至 50 万福建人移民海外,而在 20 世纪上半叶,仅福建晋江地区就达到年

均5万人移民海外。到1955年,福建华人华侨数量达到约37万人。改革开放后,福建又再一次涌现移民热潮,1990年移民人数达到3万余人,1996年达到53万余人,2005年达到150万人,而到2009年时达到了200万人。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福建籍华人华侨现约1580万人,遍布世界188个国家和地区。^[5]尽管福建省的人口数量不足全中国人口数量的3%,但福建省的对外移民人数却占到中国大陆海外移民人数的29%。而且,福建移民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在福建移民较为集中的东南亚地区,如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福建移民不仅经营着传统商业、对外贸易以及与之有关的造船、航运、汽车等运输部门和银行、信汇局等金融部门,而且还逐步渗透进橡胶、榨油、罐头、肥皂等轻工业部门以及橡胶和椰子种植园等农业部门,甚至进入了重工业、电子工业等前沿工业部门,有的企业已发展成为当地知名财团^[6]。而福建移民素来重视血缘亲情与具有极强的宗土情结,这使得他们虽然已实现国族身份转换,但依旧与中国国内亲友与社会保持紧密且频繁的联系,而且随着福建移民凭借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的上升日益融入主流社会,他们对所在国的舆论引导力也在不断加强,这无疑有助于推动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社会与文化交融。

再者,交通联结、经贸合作与人口迁移也带动了文化交流与交融。作为“活海丝”的重要起点和支点,福建与其它国家人文交流历史可谓源远流长,特别是在福建加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三所城市——泉州、福州、漳州中都存留着大量中外文化交往、交流与交融的历史遗迹。如泉州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早于宋元时期,印度教、基督教、摩尼教与伊斯兰教等一些外来宗教及文化便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泉州。这里出土的印度教石刻和基督教墓石,发现的锡兰王裔墓、灵山圣墓与穆斯林墓碑石以及艾苏哈卜清真寺、开元寺等历史遗迹都是多元宗教、民族、文化在这里相生相融共同发展的有力证据。

在外国宗教与文化陆续传入福建的同时,福建也将中国的儒教、道教等宗教信仰、民俗文化乃至语言传播出境,如妈祖信仰、郑和文化以及闽南语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妈祖信仰于宋代海外交通兴盛时在福建源起,此后随着福建对外贸易与移民的扩展,逐渐传播到全国各地,而后又散布到东南亚和世界很多地方,在中国沿海港口、日本、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菲律宾等国家都可见到妈祖庙宇或祀奉场所。郑和文化则是另一典型案例,它在东南亚及南亚伊斯兰信仰国家有着广泛认可和深远影响。目前在东南亚国家,较为著名的郑和寺庙有十余座,相关传说有几十个,与郑和有关的地名更是数不胜数。^[7]与此同时,闽南语也随福建移民的迁入不断地融入移民地语言中,如泰语、马来语、印尼语都明显受到了闽南语的影响,其中结合了不少闽南语的词汇,而闽南语中同样可见不少其它语言的痕迹,体现出语言文化间的交流互动与融合。这些“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活动都可被视为我国与“海丝”沿线国家文化交往融合的历史典范。

因此,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源地以及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区,福建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人脉资源以及悠久的对外文化交流历史都为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沟通、理解与互信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与地区之间软联通的实现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福建推进“软联通”建设的路径选择

在新形势下,如何利用福建悠久的对外交往历史、数量庞大的海外华人华侨、深厚的人文认同基础等优势来推动

“软联通”的达成与实现,成为福建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的重要任务。在“软联通”的推进过程中,文化交流与信息传播的价值理念、路径方法以及参与主体等都有待转变与重构。

(一)秉持“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最早形成于201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在该白皮书中,“命运共同体”被认为是“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的一种新视角。此后不久,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8],首次向世界宣扬了“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此后,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巴黎气候大会、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国际国内重要场合百余次谈到命运共同体,将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推展至文化、环境、互联网治理等诸多领域。2017年3月,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通过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的两个决议中,首次采纳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说法,表明这一理念已具备世界范围内的认同基础。

具体到“共同体”,原为社会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源于古希腊语Koinonia,原本指代在城邦(polis)中建立的市民共同体。在著名的《政治学》论著中,亚里士多德曾将“城邦”描述为由于人们的“共同利益”与“共同生活”集合产生的群体内部平等个体之间的自由场所,人们在城邦内可以通过群体的共同活动来追求其共同利益。^[9]发展迄今,“共同体”这一概念发展远超出具体场所的范畴,不断延展至组织、社区、区域、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但凡有着共同的目标、认同与归属感并且利益相联的群体和组织都可被看作共同体。从这一意涵出发,我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概念力图跨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传统的差异,寻求其间存在的共同利益,并基于这种共同利益实现合作。这一概念与中国一贯倡导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一脉相承,旨在同世界具有不同传统和观念的国家实现互联互通,达成合作与共同发展。

基于这种认识,“构建命运共同体”也理应成为福建打造“软联通”时的基本理念,正如此前有学者从传播学角度提出,基于共同体验产生的具有广泛认同性的“通感”(sense of commonality)能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传播效果,因为在共同体验的过程中,语言、习惯、风俗乃至不同民族、国籍及身份认同间的差异得以消减。而这种共同体验来自于文化认同塑造的吸引力,而非源自政治层面的强制遵从。^[10]由此,“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有助于改变以往对外传播时仅关注中国文化和中国价值观的单向输出的传统做法,超越由民族国家、地域之间已经筑起的藩篱,将具有不同文明特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串联起来,形成对彼此价值观、发展观的认同,建立起平等、开放的信息与文化的交流和交融模式,最终促成共同发展。

(二)构建分层推进的区域传播格局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历史、制度、文化存在差异,使得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与地区间的信息传播与人文交流也呈现出复杂性与多层次性,于是,强调应对不同区域特点、重视传播的多层次性的“区域传播”概念显示出其在促成“软联通”实现时的独特作用。

区域传播关注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区域文化信息交流,它的兴起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主义”的复兴与崛起。“区域主义”强调通过相近或相邻国家的政府间合作,



加强区域内政策、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互动^[11]。近年来,因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贸易竞争的加剧和生产组织结构的重组所推动的,区域主义的研究议题也过渡到更为强调多方面、多层次与开放性的国家和地区之间联合发展的“新区域主义”。随后,一批学者将区域主义引入传播领域形成区域传播研究,其研究议题不仅涵盖了国内层面的地方、民族及区域传播,还涉及国际层面的跨国传播与跨区域传播的问题与模式等^[12]。于是,区域传播强调区域的多层次性与多方面性,依此对区域传播战略和区域传播模式作出适应性选择。

从区域传播的视角出发,结合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地缘政治、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等地域远近和合作深度等因素,可将这些国家和地区划分为不同层级,进行轻重有序的传播。相较于其它区域,东盟地区与福建之间的交流合作历史悠久、经贸关系密切、文化认同度高,因此可将东盟国家视为“重点传播区域”,由此拓展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东北非等地区的信息传播和人文交流,并辐射到欧洲、北美、东亚、澳新等“外围传播区域”;而福建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移民迁移与人文交流又主要集中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缅甸和泰国这六个国家,所以可进一步将这六国作为东盟国家的“核心传播国家”。在进行具体的信息文化传播与交流时,应以核心传播国家和重点传播区域为切入点,总结既有传播交流经验,探索与创新传播交流方式,提炼形成示范模式,逐步向外围传播区域推广,由此形成从东盟核心六国到东盟其它国家、再至亚洲与非洲其它地区,并最终面向世界的具有针对性的分层推进的传播格局。

(三)官方引导与民间参与相结合

推进“软联通”的实现,还需要官方与民间的相互支持与配合。一方面,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得益于党和政府的大力推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在顺应时代潮流及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背景下由政治家领导或者说是由政府主导的一项重大国家发展战略,党和政府作为组织者和推动者为这一战略实施制定蓝图。事实上,在《福建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方案》中提出的将福建建设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人文交流的重要纽带”,并将其表述为“以海外华侨华人和台港澳同胞为桥梁,以妈祖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等共同文化为基础,以民间交流为主体、政府间交流为支撑,加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13]的相关论述即体现着福建官方对于如何推进“软联通”的理解与规划,而其具体落实还需党和政府进一步出台相关政策与配套措施予以保障。例如,在关系发展方面,福建省地方政府可积极发展与其它国家省市的友好关系,将此作为彼此加深了解、交流合作的重要官方途径;在资金资助方面,可以通过设立专项基金的方式为福建省的信息传播与文化交流项目提供资金扶持,鼓励福建媒体与文化企业走出国门;在制度保障方面,可以提供制度化的交流合作平台如开展论坛、协商会议、高等教育合作、联合研究等活动,由此为“软联通”的实现提供稳固有力的官方支撑条件。

另一方面,“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软联通”的最终落实仍体现于“民心相通”,因此还积极鼓励民间参与,加强民间的友好往来。长期以来,在我国乃至东南亚地区“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下,民间交往作用的发挥受到诸多限制。但在当下“国际社会”和“全球社会”的双重结构已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14],早以前以国家间互动为主的“国际政治”也逐渐转型为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乃至个人等各种主体都参与其中的日益多元的政治结构^[15],以及全球公民社会浪潮席卷之下民间社会不断崛起的背景下,相对于官方交往易受政治因素与行政因素影响往往具有

阶段性与反复性,民间的互动、合作与交流因其强烈的参与感、真实感以及长期稳定性,日益成为不同国家与地区间交往的重要渠道。

首先,鼓励与利用工作、经商、求学、旅游等多种途径的民间访问与交流形式,尤其要充分发挥福建籍海外华人华侨既具有与福建深厚的血缘、地缘、人缘关联,又熟知居住国当地社会与文化相关情况的特点,将他们作为有效联通的桥梁,使得中外民众进入共同的学习、生产、生活的社会关系网中,以稳定交往机会、积累相互信任感。其次,在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互联网与移动通讯设备因其开放性、交互性与多元化的特点成为各国民众的重要联络工具,因此,可利用各种新兴媒体与通讯技术将不同国家民众紧密联系起来,推动民间互动交往向更深层次发展。再者,突破民间与政府各自分立的交流状态,促成民间组织与政府形成积极的“合作伙伴关系”,推进多种形式及多边对话、互动与交流,以此形成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交流,通过“软联通”的实现为互联互通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论文系福建省软科学项目“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区域传播战略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6R0093。

注 释:

- [1]苏文菁.论福建海洋文化的独特性[J].东南学术,2008(3).
- [2]郭超.国语·越语·范蠡谏勾践勿许吴成[A].四库全书精华:史部[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3116.
- [3]袁康,吴平.越绝书·纪地传[A].野史精品(第一辑)[M].北京:岳麓书社,1996:123.
- [4]范金民.明清时期福建商帮在江南的活动[J].闽台文化研究,2014(4).
- [5]曾少聪.我国海路与陆路的海外移民——以福建和云南的海外移民为中心[J].世界民族,2015(6).
- [6]浦永灏.当代福建国际移民过程的效应及其评价[J].中国社会科学,1988(4).
- [7]“郑和崇拜”在东南亚[J].海南档案,2005(3).
- [8]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EB/OL].人民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324/c1024-20892661.html>.
- [9]杨晓东,马俊峰.共同体演进的逻辑与自由人联合体的产生[J].理论界,2012(6).
- [10]谭峰.“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构的两大转变[J].对外传播,2015(4).
- [11]陈瑞莲.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缘起与发展[J].政治学研究,2003(4).
- [12]张生祥,何晶.试论区域传播学[J].河南社会科学,2002(3).
- [13]福建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方案[EB/OL].人民网: <http://fj.people.com.cn/n/2015/1117/c181466-27114849.html>.
- [14]叶黎明.世界历史的“双重结构”与当代中国的全球发展路径[J].中国社会科学,2012(6).
- [15]刘德斌.公共外交时代[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3).

作者简介:

殷琦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刘君荣】